

時代的裂痕， 世代的反思

《文星》、外省第二代、與戰後台灣文化政治變遷

從50、60年代之交，到70年代，乃至於90年代之後的晚近，戰後台灣的外省人「第二代」現象持續浮現。

這種「第二代」現象所涉及的，是不同時期的年輕世代者與台灣社會變遷的關係、他們對變化中的社會關係的反思，以及反思之後所發展的認同。

◆蕭阿勤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文星》雜誌在1957年11月創刊，於1965年12月發行第98期後被查禁。《文星》發行八年多的時光，橫跨戰後台灣的50年代末與60年代上半葉，承載著當時一股渴望突破現狀的社會伏流，既挑戰文化，也衝撞政治。就《文星》在當時的定位與意義而言，論者已多。不過將近半世紀後回顧，我們有必要一問：《文星》與現在的我們有何關係？

《文星》不只是一份刊物，也標誌著一個時代、一個世代。李敖在其中發表的文章所激起的中西文化論戰，參戰者來自各方，遍及港台，是《文星》發行期間所引起而最受人矚目、影響最大的事件。這個論戰既起於時代的裂痕，也糾結著世代的衝突。讓我們從世代的角度，回顧戰後台灣三個時期的「外省第二代」現象，看看《文星》的時代與當前的我們有何關連。

60年代初外省籍知識階層的世代衝突

戰後流亡來台的外省人，隨著時間流逝，逐漸顯現內部的世代差異。50、60年代之交，外省籍年輕知識分子是創作現代詩、現代小說、現代藝術、現代音樂風潮的主力。這股追求

「現代」的動力，有著他們對上一代的刻意區隔與不滿，浮現他們自己的世代認同。1961年春，外省籍年輕知識分子提出世代「接棒問題」，議論紛紛。1962年發生「中西文化論戰」，外省籍年輕知識分子以「現代化」為題的論述，批判保守的上一代知識分子，間接挑戰與這些上一代的世界觀親和的黨國。這是戰後外省籍年輕知識分子第一次向上一代的公開激烈挑戰。

外省人離鄉背井，有家恨，有國仇。到60年代初，對外省人來說，被迫渡海來台，不過發生在十幾年前而已，記憶猶新，創傷無比重大，難以排解。中西文化論戰中年輕知識分子對上一代的攻擊，與這個重大創傷密切相關。不管老少，他們激情爭辯，透露流亡者的焦慮與挫折，糾結著對過去、現在、與未來的回憶或想像。

論戰中，李敖所代表的外省籍年輕知識分子，來台時差不多是十幾歲的中學年紀。60年代初，他們在二、三十歲之間，大都接受了大專以上的教育。他們挑戰那些在中國大陸時已經成年、而在60年代初四、五十歲以上的上一代知識階層。李敖認為「充滿了失敗經驗的上



《文星》不只是一份刊物，也標誌著一個時代、一個世代。

一代人們」必須為年輕一代所處猶如「文化沙漠」的貧乏環境負責。他吶喊：年輕一代「今日的缺乏營養與氣魄是戰亂流離的必然結果，這個責任，要由上一代來負！」

以李敖為首的外省籍年輕知識分子，支持當時中央研究院院長胡適提倡的自由主義與西化理念，追求進步、嚮往西方為代表的現代文化。他們將所抨擊的上一代知識分子劃歸為傳統、崇古、保守、退步的陣營。那些被李敖等所批判的對象，以及與國民黨有各種深淺關係的外省籍知識分子，則詆毀這些年輕一代屬於胡適所指導的陰謀集團，與當時兩年前被捕的雷震為同路人。

清末民初中國飽受外國強權欺凌的一段痛苦的歷史，深深影響論戰中的外省籍年輕知識分子。他們有著強烈的國族認同，運用現代化論述來批判上一代，認為要追求國族富強，必須學習西方的現代文化。那些上一代外省籍知識分子指責李敖主張「西化」，他則斬截地回應說：「這一代的青年們對跟那些時代的泡沫們窮纏並沒有興趣，因為他們志不在此！他們有

他們真正的遠景和抱負，有他們現代化中國的藍圖。」懷抱強烈的中國民族主義，渴望中國的現代化與強大，外省籍年輕知識分子的理想所寄，不在寓居的台灣，而在等待重返的大陸。李敖宣稱他所屬的「迷失一代的青年人必將回歸到憤怒的一代」，而「他們的轉變成功之日，就是中國的前途開明之時。救國建國是百年大計，他們的眼光不在這彈丸小島，他們的眼光是在光復大陸之後！」

70年代回歸現實世代中的外省籍年輕知識分子

冷戰與國共對峙的格局確立，外省人的歸鄉夢逐漸難以實現。到了70年代初，他們已歷經二十幾年在異地的徬徨與調適。釣魚台主權爭議事件、美國尼克森總統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喪失在聯合國的席位、對日斷交等政局的劇變，使那些比李敖年輕、完全在台灣出生或開始接受學校教育的外省籍年輕知識分子，萌生鮮明積極的世代意識，開始公開批判自己與父祖輩的流亡漂泊心態，企圖更瞭解台灣的歷史文化，並融入社會現實。當時外省



李敖在其回憶錄中，剖析「文星」與他的一頁歷史。

籍年輕知識分子批判國民黨統治下的政治與文化、要求改革與民主等，其人數之眾多與態度之激烈，不亞於本省籍者。他們具體的社會政治改革要求（例如要求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充滿了對上一代的不滿，以及「回歸現實」的理念。

例如70年代初一位外省籍年輕知識分子陳潭生談到上一代流亡來台者的游移心態與當時留學移民的風氣時，直率地批評：「從大陸來台的這些家長們，他們曾有過與共產黨爭鬥的經驗，但這個經驗是慘痛的，是失敗的。雖然在台灣高唱了二十多年的中興大業，但最不具中興信心的是他們。他們在基本上不願意子女再捲入政治鬥爭的漩渦中，甚而希望其子女逃離台灣這塊政治鬥爭的是非之地。二十年來的留學熱潮就是這些人攪起來的。他們是失敗主義者，並且將其失敗主義的情緒傳播給他們下一代。」

外省籍詩人高準則談到他也關心大陸的人民與土地，「但1949年以來的大陸我沒有生活過，而要認識任何事物，除生活在那個環境

中，是難於真正洞悉的。」對他而言，台灣與大陸之間已有巨大的「文化矛盾」。他說：「然余既生為中華民國之人民，自八歲抵台灣，生平絕大部分時間在台灣渡過，是以不能不熱切的關懷台灣的人民與社會，盼望它能進入較好的境地。」當時的南方朔（王杏慶）在放棄出國留學後，誠摯地說道：「我是個出生在大陸，成長在台灣的人。對於這塊養我、育我的土地和人民有著無比的感受和熱愛。」

曾經熱心參與台大學生保釣運動的馬英九，也受到回歸現實與鄉土潮流的影響，他後來留美，80年代初返國前夕寫道：「我常想，我們這一代，既不是『失落的一代』，也不是『無根的一代』，而應是『反哺的一代』。我們上一代把青春埋葬在連年的烽火中，才使我們卅年來享受到中國近代史上空前的承平與繁榮。對於台灣這個母社會，我們虧欠得實在太多了，任何一個在台灣生長的人都應該時時以反哺為念。」2000年左右，馬英九也曾回憶指出，保釣運動對台灣島內的知識分子而言，是一種「本土的省思運動」。

90年代本土化趨勢中的外省人第二代現象

1980年代之後，以本省人為主的「黨外」與民主進步黨領導的政治反對運動積極宣揚台灣意識，台灣民族主義運動顯著發展。1988年，本省籍的李登輝繼承蔣經國，成為國民黨主席與總統。在國民黨黨國決策階層中，本省籍的人數逐漸超過外省籍者。1991年，原本於中國大陸選出的第一屆未定期改選之中央民意代表

終止行使職權，國會全面改選。90年代初，國民黨黨內反李登輝的「非主流派」與親李的「主流派」鬥爭而失勢。以外省籍年輕一代為主而反李、懷疑他傾向於支持台灣獨立的國民黨內「新國民黨連線」人士，於1993年另組「新黨」，與民進黨及其他支持台灣民族主義者之間的衝突激烈。1996年，台灣舉行戰後首次的總統民選，國民黨候選人李登輝獲得過半票數而連任。伴隨上述政治變化的，則是過去由國民黨威權統治所教化、基於中國民族主義的歷史敘事、集體記憶、文化象徵等，在國家的文化教育政策與公共領域的文化論述中，都備受挑戰。

上述政治、文化的「本土化」或「台灣化」變遷，對許多外省人來說，代表他們在政治、文化上實質的或象徵的地位逐漸式微。90年代初，許多外省籍的政治或文化菁英，尤其是年輕一代者，開始公開表達他們認為在政治、文化上被排斥所帶來的焦慮。台灣社會的公共輿論、學術研究、文學書寫，也逐漸觸及所謂「外省第二代」的現象，探討他們面對政治、文化本土化或台灣化時客觀的社會處境，以及主觀認同上的疏離、抗拒、或調整、接受等不同的反應。比較之下，90年代以來「四大族群」概念中，福佬、客家、原住民的年輕世代可能面對的問題並沒有受到類似的關注，而外省第二代在晚近政治、文化變遷中面對的問題則備受矚目。這是由於他們屬於實質上或象徵上原來居於優勢社會地位的少數族群，因而他們在變遷中重新適應調整、面臨實際與心理困境的表現，格外引人注意。

以本省籍人士為主的政治反對運動，歷經黨外時期到成立政黨的三十年左右對國民黨統治的挑戰，終於在2000年由陳水扁、呂秀蓮當選為中華民國第十任總統、副總統，使掌握政權超過半世紀的國民黨成為在野黨，也使戰後台灣出現第一次的政黨輪替執政。2008年3月22日的總統、副總統選舉，由國民黨的候選人馬英九、蕭萬長以將近六比四的得票優勢當選。歷經民進黨陳、呂兩個任期八年的主政，國民黨重新取得政權。

2008年大選的第二天，各種媒體都以相當多的篇幅報導結果。其中，在政治立場上一向較偏於反對國民黨的《自由時報》，在當天的社論中，像其他許多媒體一樣，認為這次總統大選過程平和，以及產生政黨執政的二度輪替，代表了台灣民主發展的深化與成熟。除此之外，這篇社論特別闡述國民黨重新獲得選民支持，「外來政權已經取得正當性與合法性」，並接著強調：「台北市縣、桃園縣及台中市現今都由外省族群擔任首長。昨天，同為外省籍的馬英九進一步當選總統，足見多數族群未以省籍選人，則近年所謂少數族群的危機感，既屬向壁虛構而莫須有，禁不起事實檢定，應可休矣。」90年代初以來外省人的「少數族群的危機感」，包括第二代的心裡困境，由於馬英九的主政，如今似乎相對地減低，但是否會完全消除，則像歷史上的許多社會變遷一樣，難以預料。

三個時期，有同有異

上述三個不同時期的現象，都可以歸為「外

省第二代」問題，理由在於：從客觀身分來看，它們都牽涉到流亡者的後代反思他們與上一代、故鄉（中國大陸或台灣？）、異地（中國大陸或台灣？）的關係；同時從主觀認同而言，這些現象也都顯示流亡者後代具有清楚的世代意識、從世代角度反思本身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但是三個時期中的思考出發點、焦慮所在與追求的目的，各自不同。

第一，50、60年代之交，外省籍知識階層內部浮現世代緊張，言論衝突重點圍繞在大陸到台灣的國仇家恨，追求「現代化（西化）」的年輕世代反思的問題在於「我們為何失敗？為何流亡？為何受苦？」進而溯及中國百年國恥的傷痛，反思「我們為何不如人？為何受辱？為何受苦？」他們批判那些被譏諷為傳統保守的上一代需為國仇家恨負責，主張中國文化必須徹底現代化，但未觸及台灣的現實政治，個人所寄託的國族理想實現的天地並不在台灣。

第二，70年代外省籍知識階層內部的世代衝突中，年輕的「回歸現實」世代反思的問題仍然在於「我們為何失敗？為何受辱？為何受苦？」但具體問題圍繞在國民黨政府的重大外交挫敗，逐漸喪失國際承認與支持。他們的反省轉向內政，批判的對象為戰後20年國民黨政府「反攻大陸」的宣傳、以台灣為臨時復興基地的政治體制，以及充滿流亡游牧心態的上一代。他們開始觸及台灣的現實政治與文化，要求政治革新與民主，呼籲重視鄉土文化。他們認為個人所寄託的國族理想首先必須在台灣實現。

第三，90年代之後的外省第二代現象，與前

兩個時期不同，不再是外省籍知識階層內部的世代緊張。年輕世代針對的，不再是他們自己的上一代，而是本省人為主所推動的政治、文化本土化。他們反思「我們為何受辱？為何受苦？」的問題，關懷的是他們本身當前與未來的社會處境，而反思的結果多樣，對於政治、文化本土化有疏離、抗拒者，也有自我調整、接受者。

時代裂痕的試煉，世代反思的轉變

世代不是純粹生物年齡的現象，而是與特定歷史階段的政治與文化有關。人們在特殊的時空會以世代來思考，這種現象事實上統合了許多迥然不同的、似乎不相關連的事情，反映的是一種歷史關係。英國史學家Edward P. Thompson強調：「階級是人們在走過其自身的歷史時定義出來的，而最終，這也是它唯一的定義」。他對於階級的觀點，同樣適用於世代。

戰後三個時期的外省人第二代現象中的年輕世代，並不是同一批年輕知識分子。歲月推移，前一個時期的年輕世代，到了下個時期可能已成了上一代。許多外省人至今在台灣也可能已有了第三代，甚至第四代也開始呱呱墜地。然而從50、60年代之交，到70年代，乃至於90年代之後的晚近，戰後台灣的外省人「第二代」現象持續浮現。這種「第二代」現象所涉及的，與其說是實際的人口年齡層與生物傳衍的具體世代關係，毋寧說是不同時期的年輕世代者與台灣社會變遷的關係、他們對變化中的社會關係的反思，以及反思之後所發展的認

同。外省人第二代現象牽涉的，不僅是客觀身分的問題，更多的是主觀認同的問題。

戰後台灣的外省人「第二代」現象持續浮現，反映流亡者後代與上一代、故鄉、異地，以及與過去、現在、未來的關係，一直缺乏相對的穩定。戰後台灣不同時期成長的外省籍年輕世代，受到不同政治、文化議題激發，面對不同社會情境，從世代角度思考自己與外在世界與社會變遷而有所主張時，即使他們可能已經是第三代之後，但都彷彿仍然是與異地、現在、未來的關係還不確定的流亡者「第二代」，反思著他們與「上一代」的故鄉與過去的關係。這些反思在不同的（三個）時期有所差異，亦即外省「第二代」做為一種意識或認同，在不同時期，其內容並不相同。

法國學者高格孚（Stéphane Corcuff）曾根據訪談調查，指出1988到1997年李登輝總統主政期間政治與文化的本土化或台灣化過程中，愈來愈多的外省人認同台灣，他們本身產生明顯的台灣化，亦即「外省人的台灣趨向性」。高格孚強調外省人經歷了視台灣為「異鄉」到視之為「家鄉」的轉變，但外省人本身沒有完全承認這種變化，而其他族群也未曾充分瞭解。外省人並非同質的群體，他們關於國族認同與兩岸關係的看法並無共識，其中尤其呈現明顯的世代差異。愈年輕的外省人，顯示更高程度的台灣認同。在理解社會變遷上，研究年輕世代顯得特別重要。徐永明與范雲也曾運用抽樣調查資料，研究1986~1996年間台灣認同的變化，指出世代會影響個人對於外在環境變

遷的調適差異，年輕世代要比年老世代更能接受新的政治資訊、吸收新的政治衝突，因此進行自我調整而改變政治認同。這兩位作者發現他們所研究的這段期間，本省籍或外省籍都一致朝「台灣人認同」的方向移動，或是離開「中國人」的單一認同。年輕世代認同變化的幅度、速度與持續性，不分省籍差異，都較其他年齡者更顯著。這兩位作者強調，「在政治變動劇烈的環境中，年輕世代因此將成為學習新認同並予以發展的最可能攜帶者」。

2012年的總統大選即將來臨。外省人的「少數族群的危機感」是否真的會逐漸削減，不再有「永遠的外省第二代」？這一點，我們難以預知。人們關於我是誰，關於自己與社會、國族等外在世界關係的思考，既屬於特定歷史的，也屬於特定政治的。特定認同的建構發展與相關行動的出現，有賴特定歷史條件的機遇幅輳。人們各有其客觀的社會身分，但足以激發人們集體行動的認同發展，卻不是任何時候都存在，也不是永遠存在於任何具有相關的客觀身分的人們身上。戰後台灣三個時期的外省第二代「問題」，不是當時所有外省籍年輕世代的問題，不是他們都一致關懷的。回顧《文星》以來的半世紀，未來是否還會有引人矚目的「外省」加上「第二代」的現象出現，我們不得而知。世代認同反映人們特殊的歷史意識，以及他們對於自己社會存在的感受。時代的裂痕不斷考驗我們，逼問我們要成為怎樣的世代，創造怎樣的台灣歷史。我們無從閃躲，但終究有成敗。